

从苏州博习医院看教会医院的社会作用与影响

王国平

[摘要] 博习医院在苏州的活动是基督新教在华活动的一个缩影。考察博习医院的活动,可以看到,一方面,基督新教在华的医学传教活动确实是“推进教务工作的最有效的媒介与手段”;另一方面,基督新教在华的医学传教活动对我国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对社会风气和习俗的改良等,也起着一定的积极倡导作用。这种“媒介与手段”的独特性,这些作用与影响对社会变迁的积极推动,以及对融洽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是其他基督教事工所不能比拟和不能替代的。

[关键词] 苏州;博习医院;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 K29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04)03-0085-07

[作者简介] 王国平,教授,苏州大学图书馆 215021

基督各派在苏州城区的开教发轫于1859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John Griffith)的活动。此后来苏州传教的还有美国的北长老会、监理会、南长老会和南浸会。监理会是最先在苏州创建诊所和医院的差会。蓝华德(Walter R. Lambuth)是最早在苏州举办教会医疗卫生事业的传教士。1877年,他在天赐庄租赁了三间民房办诊所,命名“中西医院”。1880年,回美国研习医学和医院建筑。1882年11月,携其妹夫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 1859—1927)同返苏州,着手筹建医院。翌年初,柏乐文获得教会和苏州地方人士捐款一万美金,即以一千美金在天赐庄购得民田七亩,破土建院。半年竣工,为庄园式建筑,题名“苏州博习医院”(英文名Soochow Hospital),11月8日正式开张。1884年,迁入天赐庄的存养书院也改名为博习书院。博习医院是监理会的得意之作。《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称,当时,外国各教会“在华设立之施诊所颇多,正式医院则仅设于沿海四埠耳。自上海至北京二千余里之内地,迄无一正式医院”,博习医院之创设,“实为嚆矢”。

一 行医:开创地方医疗事业新局面

为地方带来最先进的医疗技术 苏州博习医院的相关成就使苏州的医疗技术在某些方面处于当时全国医院的前沿。“1882年,蓝医生与柏乐文医生到苏州开始工作。二人来华前,先至纽约、爱丁堡及伦敦诸大医学院考察,故到华后所介绍之医学方法,皆为当时最新颖者”。柏乐文自述,他的工作“得益于可卡因、白喉抗毒素,以及X光机的发明与引进。”

“可卡因”用于眼角膜麻醉是1884年由德国眼科学会承认并推广的发明。1885年,柏乐文回到纽约学习,在医院实习时看到医生将“可卡因”用于眼角膜麻醉,立刻意识到“这奇妙的药物将会十分有助于我在中国的工作”。1886年春,柏乐文学成返回中国即将此麻醉术运用于临床,治愈了无数眼疾

《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1935年10月,第71、42页。

周承恩:《本公会之医药事业》,《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第42页。

W. H. Park, *Memoirs of Dr. W. H. Park of Soochow*, p. 36

患者。南京的李炳寿(译音),失明八年后,经柏乐文手术治疗,视力得以恢复。有一次,柏乐文去乡村巡诊,来了一个村民,他的眼球被铁匠铺的热铁屑溅伤,又红又肿,疼痛不已。柏乐文给他用“可卡因”滴患眼施行麻醉,然后用手术刀将铁屑剔出。患者惊叹一点都不痛,围观者将柏乐文视为神仙。

X射线是1895年11月8日由德国物理学家威廉·伦琴发现的。时隔不久,上海《点石斋画报》“宝镜新奇”一文中就描述了博习医院展示X光机的情景。博习医院引进使用X光机的时间,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刘善龄据“宝镜新奇”推测:“最晚在1896年,……即伦琴发现X光的次年,博习医院已经开始使用这种世界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其引进速度之快着实令人惊讶。”戴吾三考证,刊载“宝镜新奇”的《点石斋画报》“利三”期为1897年。周承恩著《本公会之医药事业》称:“1903年有前1890年来华传道之罗格思(B. D. Lucas)教士因病返国后专攻配药及X光科,重行来华至博习医院训练药剂师,主管X镜又兼传道。”

有关这一问题的最可靠史料是柏乐文《自传》和监理会年议会的报告。柏乐文《自传》在谈到1890-1903年的工作时说,“几乎每天都会到病人家去出诊。如果没有出诊,总会有朋友到我家来看人体模型与X光机。”柏乐文在博习医院1899年10月报告称:在其他捐款之外,“还为购置X光机设备募得几笔特别捐款。我希望能获得全部款项,由斐恒(J. W. Fearn)医生经手购置全套设备,在他明年秋天回中国时带回。”博习医院1903年10月报告称:“本年度支付X光机器设备税58.50元。柏乐文在美国从母会募得X光机特别拨款500美元。”又据1904年10月报告:“分工如下:柏乐文为住院部与X光室顾问,并负责门诊部与大多份出诊。斐恒医生负责住院部与部分出诊,并在下午运作X光机。罗格思则在上午运作X光机。”全年用X光机治疗病人“初诊202人,复诊855人,共1057人次”。X光机设备支出179.91元,收入132.00元。

根据上述史料,参照点石斋画报与戴吾三的考证,可以确认,博习医院1897年有了简易X光机,1903年又购买了可供诊病的X光机全套设备,并掌握了利用X光机诊病的技术且实际运用于临床。至1917年,苏州博习医院除已装备X光全套仪器外,还添置了病理切片机、显微镜、膀胱镜、验眼镜等先进设备。博习医院声誉日隆,求治者倍增。

为地方培养一流医学人才 博习医院创办伊始,就十分重视医学人才的培养。据柏乐文1909年撰文介绍,1883年,他就与蓝华德开办“博习医学堂”。1887年,与博习医院毗邻的妇孺医院成立,柏乐文与妇孺医院的斐医生合作,共同教授学生。由于规模扩大,博习医学堂更名为“博习高等医学堂”。1903年,担任东吴大学教务长的柏乐文又开始筹建医学院,教员由上述两家医院的人员及东吴大学的理科教师组成,博习高等医学堂归并东吴大学,医院不再招收学生。1883-1909年,博习医院招收培养七届学生共30余人。毕业的学生有的留在博习医院任医生、教员,有的到上海、常熟、无锡、北京、天津、武昌等地行医,有的还远赴美国深造,后回东吴大学任教。博习医院不再招生后,仍接受教会所办的医学院校学生来院实习,柏乐文本人仍担任东吴大学医学院课程。博习医院育才兴学,培养西医人才,对西医在苏州、苏南地区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促成“中西医汇通” 晚清的一些著名中医在西医的影响下,主张中西医汇通,广东的朱沛文就是以中医出身而汇通中西医的代表。苏州的中西汇通派则是另一条道路,以西医出身汇通中西医,代表人物有顾福如。顾福如,字培吴,别号聋老人,苏州人,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父亲为当时苏州的著名中医。顾福如十五岁应童子试,中苏州府元和县首名秀才,旋因科举制度被废除,乃随父亲改学岐黄。后考入东吴大学医学院学医。先后师事美籍医师柏乐文、国人西医成颂文。期满毕业时,柏乐文

刘善龄:《西洋风——西洋发明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73页。

戴吾三:《1987年苏州博习医院引入简易X光机》,《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3期。

《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第43页。

W. H. Park, *Memoirs of Dr. W. H. Park of Soochow*, p. 44

Minutes of Twenty-Fourth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1899, p. 24

《中华监理公会五十周年纪念刊》第43页。

W. H. Park, "Soochow Medical School",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 18, 1909, No. 5

赠予听诊器一只,成颂文授予抬牌一方,文曰:“柏乐文、成颂文门人,伯平子,顾福如中西内外大小方脉。”顾悬壶于苏州市甫桥西街,结合临床实践,深感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应该相互济用,不必存畛域之见。在临床工作中,常以中西两法治病,并利用化验等先进察病手段。因他诊断比较明确,疗效显著,开诊不久即声名大著,就诊者络绎不绝。据其门人回忆,当时顾氏出诊,除自己乘轿外,还另用一工人肩挑药箱相随,药箱内置有体温表、听诊器、注射器、西药等。这在当时中医界是非常罕见的。

二 社会改良:促进苏州社会变迁

戒烟 十九世纪的中国,吸食鸦片是危害严重的社会问题,苏州地区也是鸦片泛滥的重灾区。柏乐文常常接到有人鸦片瘾发作时的紧急求诊,总是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登门施治。目睹鸦片的毒害,柏乐文坚决主张禁烟。博习医院在创办之初就设有戒烟室,1900年,又专设戒烟医局。“其中经费,十分之九由柏乐文向华友筹募而来。”据统计,1908-1909年度,就收治吸食者达1210人。

英国殖民者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竟在一份皇家委员会的报告中宣称:鸦片不会对东方人造成特殊的伤害,而且对东方人来说鸦片甚至是一种好的东西,因为鸦片能治愈他们的一些疾病,而且在中国,这看起来特别地符合其人们的身心状况。柏乐文对此谬论非常愤慨,他收集了100多位医生关于鸦片在中国行销及吸食的意见,并且把这些意见汇编于*Opinions of over 100 Physicians on the Use of Opium in China*一书(1898年出版),有力地揭露鸦片在中国的危害情况,作为对英国皇家委员会报告的回击。1905年,柏乐文又在*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发表《鸦片吸食在中国》一文,继续揭发鸦片对中国人的危害,批判为鸦片吸食的辩护。

1897年,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为开展禁烟活动组织了“中国禁烟会”,因设在苏州故又被称作“苏州禁烟会”。在苏州传教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杜步西(H. C. DuBoise)任会长,柏乐文任司库,努力为禁烟募捐。禁烟会在苏州的活动收效可观。据统计,江苏原有熟膏店12790家,1909年初已减至2830家,仅苏州一城就关闭了1960家。民国时期,博习医院收治吸食者也取得相当的成绩,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1 1911-1918年苏州博习医院鸦片吸食者住院就治人数统计表

| 年份 | 住院就治者 | 男患者 | 女患者 |
|-----------|-------|-----|-----|
| 1911-1912 | 323 | 312 | 11 |
| 1912-1913 | 534 | 491 | 43 |
| 1913-1914 | 530 | 499 | 31 |
| 1914-1915 | 200 | 187 | 13 |
| 1915-1916 | 112 | 103 | 9 |
| 1916-1917 | 112 | 96 | 16 |
| 1917-1918 | 54 | 47 | 7 |

资料来源: *Minutes of the China Mission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 博习医院十分重视公共卫生及疾病的预防。当时,疟疾、霍乱、鼠疫等传染病十分猖獗,柏乐文与他的夫人及女儿都染上了疟疾。他在医院周围铺上一层石灰和砂,改善医院环境。他提出疟疾等传染病与蚊蝇、虱子的传播有关。博习医院的医生还去东吴大学演讲蚊虫的危害与防御方法,并在每晚8时到8时半开展灭蚊活动。1919年苏州时疫流行,博习医院除尽力救治病人外,还提出了清洁街道、疏通沟渠、摒绝蝇虫等预防措施。1916年,柏乐文到监狱去给犯人看病,针对

陈实:《苏州最早的中西汇通派》,《苏州史志资料选辑》(内部发行),1988年2辑。

Minutes of Twenty-Fourth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1909, p. 44
W. H. Park, "Opium Smoking in China",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May, 1905, No. 3

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9页。

犯人普遍患有严重脚气病的情况,提出改进管理、调整伙食等防治办法。正如江长川所说,博习等医院“不以治病为务,且以散布健康之方法,卫生之常识,为其重要工作,深得良医治未病之道焉。”

放足 1895年,立德(C. R. Little)夫人在中国发起天足运动,医学传教士积极参与。立德到苏州的活动得到柏乐文和博习医院的帮助。立德夫人事先请柏乐文夫人帮助召集会议,柏乐文以自己的名片发出邀请,苏州不少上流社会的妇女前来听演讲。立德的这次演讲是近代苏州第一次放足的演讲。近代苏州第一个放足会由此产生。

柏乐文夫妇还对放足妇女进行具体指导,鼓励她们慢慢放,多走路,适当用凡士林按摩。在他们支持下,谢彬达做了大量的工作,她丈夫王颂蔚为王懿十三世孙,点翰林。王氏家庭是苏州名门望族,王颂蔚于1895年在北京去世,谢彬达归苏州。她运用家族的广泛社会关系,动员苏州城乡众多妇女参加天足运动,还写了一本小册子介绍宣传和指导放足,在全国散发。谢彬达“成为立德夫人在全中国推广放足运动的最早的得力助手。”当她和另一位沈夫人怀着放足成功的喜悦走到柏乐文家并“表演”走路时,柏乐文感到:“她们正在打破两个传统,其一,女人走路不可像天足女人那样大步流星,而应走小碎步就像摇摇摆摆的百合花。其二,女人根本就不应该上街。”

葬礼使用花圈 一位苏州名门的女孩不幸患肺结核去世,她的葬礼没有按以往的做法请僧人做法道场。在她的葬礼上,柏乐文夫人和伊达·安德逊小姐使用了花圈。“这种做法使人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从那以后,葬礼中一直使用花圈。”这种葬俗还传播到整个苏州地区。

女护士看护男女病人 在讲求“男女大防”的中国社会,医院全面使用女性作护士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教会护士教育在很长时期内培养男、女护士以分别照看男女病人。中华护士会成立以后积极规划护士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在全面使用女护士上,中华护士会却很谨慎。1919年,中华护士会还认为尚未到聘用女护士来照看男病人的时候。Edith J. Howard小姐在所著《中国已经为女护士在男子医院工作做好准备了吗?》一文认为,聘用女护士来照看男病人“在未来许多年内都是不可能的。”

在这方面,苏州博习医院却是先行者。就在1919年,博习医院决定使用女护士。院方在这一年的报告书中说:“世界上无一医院可以不用看护而治病者,有看护矣而不能为合宜之看护则有与无同。本院旧有看护男子居多,现为求得合宜看护计,决定延用西国女看护五人。新屋落成后,每年招收一班女生学习,十年之内,预计完全改用女子看护,俾一般病人获有良好之裨益焉。”从1922年起,博习医院“开始全面雇用女看护,时男病房中雇用女看护很为新鲜,中外人士均以为异,但苏迈尔(John A. Snell,博习医院院长——引者注)等认为无甚妨碍,很乐意聘用。”柏乐文自豪地说:“苏迈尔医生领导下的博习医院在所有病房中使用女护士方面在中国的教会医院中率先垂范,是一项取得极大成功的创新。”其他一些教会医院也相继打破旧俗全面聘用女护士。据1933年马雅格的调查,在167所医院中,60%的医院(占101所)使用女护士照看男病人。马氏认为,“很明显护士已成为女性的职业”。女护士照看男病人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习俗。

女子从事护士职业,是近代中国风俗变迁的一个侧面,她们不仅在国内从事各种服务,而且走出国门参加国际活动。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州天赐庄妇孺医院的护士生在外国医生的带领下前往海參崴从事战争救护。有的中国护士还参加了国际护士会等。

江长川:《发刊词》,《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

薛利华:《洞庭东山掌故》,1997年10月版,第53、187页。

W. H. Park, *Memoirs of Dr. W. H. Park of Soochow*, p. 51- 52

W. H. Park, *Memoirs of Dr. W. H. Park of Soochow*, p. 37, 39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L. 1919, p. 356

《1919年(中华民国八年)监理公会苏州博习医院报告书》,藏苏州市图书馆。

《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苏州第一人民医院院志》(打印稿)1986年,第6页。

W. H. Park, *Memoirs of Dr. W. H. Park of Soochow*, p. 36

James L. Maxwell, *The Mission Hospital in China*, p. 57.

三 融洽教会与当地社会的关系

由治病为媒介,博习医院与教会进入了苏州上层社会。王氏家族是苏州名门望族,王家一个女孩跌摔磕在碗边上,前额出现一个大伤口。郎中医治不当,致使女孩感染发烧,病情越来越重,最后只好求治于博习医院。待女孩痊愈,博习医院也赢得了王氏家族的好感。柏乐文说:由于王氏家族的影响,博习医院“取得了进入苏州家族的‘门票’。”

同样由治病为媒介,博习医院与教会同苏州官府结下了非常好的关系。1892年5月,江苏提督的侄子被人报复行刺,中了两枪,头部严重砍伤,有五处横贯头顶的刀伤,伤口长达三至六英寸,刀伤及骨,其中一处深及硬脑膜。另有几处刀伤呈斜向,劈下了几片骨头。手被打断,背部、颈部也都是伤口。经几天医治无效,大家都以为必死无疑。柏乐文给他做手术,清除坏死的骨头,清洁伤口,缠以消毒纱布,用夹板固定断臂……。经过几个星期的治疗和护理,使伤者起死回生。由此,清政府授予柏乐文五品衔,并成为名誉军医。

由于博习医院在苏州城乡广泛行医,救死扶伤,博习医院与教会早就和苏州底层社会建立了很好的联系。“柏医生为人谦和,善与人交,至苏不久,已得当地人信任。”据谢颂三撰《柏乐文医生传略》,“1900年北方有拳乱,在苏西国传教士逃避一空,惟柏公仍留苏服务。一日匪徒包围柏公出诊时所乘大轿,欲得而甘心,待见柏公颜面,即称‘柏好人,柏好人’,去而之他。”

苏州作为一个传统社会,对于外来的基督教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接受的。《王韬日记》1859年3月7日记:“近英人杨雅翰至吴门赁屋讲书,言日后将择地建礼拜寺矣。侏俚日迫,为祸日深,将奈之何?小异言,苏城绅士,于朔望必集中讲说。乡约别于生员中简数人在每巷讲解性理,勤勉者例得报优。盖隐与西人为敌也。”社会上层如此,社会下层也流传对基督教不利的谣言。1886年,美国监理会惠会督夫妇到苏州,惠夫人写给在美国的女儿信中说到,她感到奇怪的是,在苏州街道上,小孩看到她常常闭上眼睛。原来,孩子们听说,“‘耶稣人’用他们所能偷到的眼睛制药。这种药能使人不由自主地信教。”博习医院创办之时以及最初发展阶段,正是中国各地“反洋教”运动日益高涨时期,但在苏州地方,却未曾发生一例反洋教事件。博习医院等教会医院的活动及其积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四 经济方面推动苏州基督教会事业的发展

作为教会医院,博习医院本身就承担直接传教的职责。博习医院的宗教活动一直是医院的重要活动内容。1933年,医院还专门设立了宗教科。该院的年度报告也经常提及这方面的进展。例如,1897年两个瞎子治好入教,医科学生多为教徒。1898年有5人入教,3位是就医的病人,一位是住院照看儿子的父亲,一位是看门人。历年来,在博习医院就治而后入教的人不在少数。发展病人入教之外,博习医院还在职工中进行制度化的布道活动,“每天早晨全院职工必集于一处,同做晨祷(早礼拜):先全体合唱赞美诗,后由主领牧师或朗读圣经,或宣讲福音,晨祷为时约5到10分钟”。尽管博习医院在医学传教方面不无成就,但比较而言,她对苏州地方基督教会事业的推动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

首先,博习医院在创办后不久,便努力“自养”,减轻了母会拨款的负担。

W. H. Park, *Memoirs of Dr. W. H. Park of Soochow*, p. 48

Minutes of Seventh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1892, p. 26

周承恩:《本公会之医药事业》,《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第42页。

《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第57页。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第91页。

Mrs A. W. Wilson, *Letters from the Orient to Her Daughters at Home*,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Nashville, Tenn. 1890, P. 167.

《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苏州第一人民医院院志(1883-1983)》(上册)1986年铅印本,第28页。

表 2 是博习医院创建后最初 20 年经费来源及其年度结余情况统计。

表 2 博习医院最初 20 年的主要经济情况

| 年 份 | 总收入 | 教会拨款 | 教会拨款百分比 | 捐 赠 | 海关薪金 | 结 余 |
|------|----------|---------|---------|----------|---------|----------|
| 1889 | 1812.30 | 500.00 | 27.60 | 26.00 | | - 432.07 |
| 1890 | 2520.33 | 1284.95 | 51.00 | 37.00 | | - 87.69 |
| 1891 | 2526.18 | 1351.71 | 53.50 | 92.80 | | - 303.38 |
| 1892 | 2547.92 | 1323.75 | 52.00 | 260.00 | | - 406.33 |
| 1893 | 4772.08 | 3443.75 | 72.20 | 22.00 | | 146.50 |
| 1894 | 3492.29 | 1865.79 | 53.40 | 0.00 | | 1029.18 |
| 1895 | 4667.88 | 1827.27 | 39.10 | 0.00 | | 846.70 |
| 1896 | 4343.85 | 1787.14 | 41.10 | 50.00 | | 13.85 |
| 1897 | 4842.13 | 1717.51 | 35.50 | 82.32 | 893.75 | - 69.81 |
| 1898 | 6279.02 | 1278.97 | 20.40 | 1177.75 | 892.56 | 30.49 |
| 1899 | 7327.86 | 403.95 | 5.50 | 516.77 | 1007.10 | 1009.00 |
| 1900 | 7815.45 | 390.96 | 5.00 | 1640.97 | 1129.78 | 473.89 |
| 1901 | 6147.72 | 394.28 | 6.40 | 734.00 | 1126.17 | 1166.28 |
| 1902 | 7791.71 | 100.00 | 1.30 | 1036.82 | 1343.77 | 419.18 |
| 1903 | 6781.34 | 477.93 | 7.00 | 591.85 | 1335.21 | 1002.75 |
| 1904 | 16005.31 | 162.63 | 0.10 | 6527.52* | 1350.20 | 7678.14 |

资料来源: *M inutes of the China Mission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M. E Church, South*.

* 其中江苏巡抚恩寿等官员捐款 3000 元

年议会始于 1886 年, 最初 3 年没有博习医院的专项报告。由表可知:

第一, 在二十年的经营中, 前几年略有亏损, 1893 年以后, 基本没有出现亏损。

第二, 自博习医院创办至 1896 年, 医院经费基本上依靠教会的拨款。如 1890 年至 1894 年, 母会拨款均占医院当年总收入的 50% 以上。

第三, 自 1899 年以后, 博习医院基本上做到自养。母会拨款仅占总收入的 5% 之左右。所以能如此, 一是得益于柏乐文的兼职收入。柏乐文 1897 年说, “本年度初, 我被任命为最近建立的苏州海关医生, 这一职位的薪金对我们购地与建房相当有帮助, 现在我们不用买更多的土地了。我希望。如果这笔薪金能继续得到, 不久就能使医院自养。” 1899 年, 海关薪金达到 1007.10 元。二是得益于捐款的增长。1899- 1904 年, 平均每年捐款为 1958.21 元。三是得益于医院的医疗收费。1899 年, 医院的医疗收费高达 3500 余元。博习医院在自养方面卓有成就, 柏乐文说: “在中国教会医院的自养活动中, 博习医院总是领先者之一。”

其次, 推动其他教会事业的发展。

监理会苏州宫巷教堂的建筑得益于博习医院的经济支持。柏乐文在自传中说: “我感到荣幸的是, 我从博习医院预付资金, 帮助李伯莲在苏州城中宫巷购置了一片土地, 得以建筑一座辉煌的教堂。” 这座教堂是最好的中国基督教教堂之一。

东吴大学的创办得到柏乐文的筹措的大量捐款。1900 年东吴大学筹建时, 柏乐文的任务就是“征集苏州、无锡、常熟和南浔等地上流人士的赞助”, 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是他的病人, 并对他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在这些捐赠中, 有五百美元是南浔的张丕春(音译)(Chang Pi-Chuen)先生所捐, 他是柏乐文医生的一位病人, 是柏乐文带他到美国, 到一位专家那里就诊。他的近乎失明的眼睛恢

M inutes of Tw elf th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1897, p. 26

W. H. Park, *M enoirs of Dr. W. H. Park of Soochow*, p. 36

W. H. Park, *M enoirs of Dr. W. H. Park of Soochow*, p. 37.

复到接近正常的视力,这笔钱算是他的谢礼”。博习医院又“为建筑景海女子师范学校的大楼筹措资金”,这是一座纪念海淑德(Laura A. Haygood)女士的辉煌建筑。柏乐文担任了这个学校董事会的司库。此外,柏乐文还帮助监理会女布道会“金振声(Virginia Atkinson)夫人租了一座建筑开办学校,开创了女布道会在慕家花园的极佳事工。”

再次,在监理会在华自养活动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自1934年始,监理会实行“十年自养计划”,“以全议会每年五万五千元之预算,为最小限度”。其时,“该院因苏医生之主持,医药程度甚高,外科一部之收入亦可观,对于年需十万元之自养金大得帮助。”正因为博习医院的经济活动对监理会在华事业影响至巨,年议会在介绍苏迈尔院长时称:“苏迈尔医生为美国外科专门学会会员,今在苏州博习医院服务并负重大经济责任。”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曾这样评说教堂、教会学校、教会医院、教会文字宣传等教会事工对基督教传教的作用:教堂讲道花费时间太长,传教士接触信徒的数量有限,他们很难影响全体中国人;用办学校的方法去传教也是比较慢的,因为传教士不可能在中国各地都建立起学校,学生经过好多年的培养才能在社会上起作用;开办医院“收效也不很大”,因为“通过院所接触的都是病人,而病人又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他认为文字布道是最有效的方法,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他并不推崇教会医院的活动。另有一些传教士认为,“行医只是在开辟传教的初期有作用,使用它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偏见,获取信任和建立教堂”。“当以上几点实现后,传教就毫无困难,行医这种方式也就应当取消了。”这种观点又从发展阶段的角度轻视教会医院的作用。对苏州博习医院活动的考察可以说明,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

柏乐文在一份关于苏州博习医院的报告中说:“令人极其满意的是,我们在博习医院看到医务工作在克服困难中稳步发展,成为推进教务工作的最有效的媒介与手段。”博习医院在苏州的活动是基督新教在华活动的一个缩影,考察博习医院的活动,可以看到,一方面,基督新教在华的医学传教活动确实是“推进教务工作的最有效的媒介与手段”;另一方面,基督新教在华的医学传教活动对我国医疗水平的提高,对社会风气和习俗的改良等,也起着一定的积极倡导作用。这种“媒介与手段”的独特性,这些作用与影响对社会变迁的积极推动,以及对融洽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是其他基督教事工所不能比拟和不能替代的。

(责任编辑:张 剑)

文乃史著,王国平、杨木武译《东吴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20、21页。

W. H. Park, *Memoirs of Dr. W. H. Park of Soochow*, p. 37.

《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第15页

《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第44页。

江文汉:《广学会是样一个机构》,《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第7页。

Robert Case Beebe, "Hospital and Dispensary", *The China Missionary Journal*, Vol XV, 1901, No. 1, P. 12
3 Minutes of Fourteenth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1899, p. 24

government

Social Function and Effect of Parochial Hospital: Take Soochow Hospital as Example

WANG Guo-ping

After investigating the activities of Soochow Hospital, 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the medical work of missionaries was not only the useful media of missionary work of Christian in China, but also was be of benefit to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The Impact of Christian Church on French Society in Middle Ages

XU He-sen

Because of general chaos and dominant position of barbarian in Middle Ages, the Christian church was the heir to Roman civilization in some extent.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civilization and cultivating Germanic people. Meanwhile, it also built up supreme authority in French.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its authority met with challenge from upper and lower society.

Underground Anti-Japanese War in the city: Heroic Spirit of Chinese Spy Organization During Sino-Japanese War

YE Wen-xin

By studying history of BMIS in 1939, this article tried to reveal the fact how the BMIS made use of traditional idea in history novel to encourage spies. It was believed to be helpful for us to grasp the nature of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of KMT in Shanghai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sperous Yue Opera in Isolated Shanghai

SONG Jing

Traditional Operas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in Shanghai urban life during modern China. As a regional opera, Yue Opera developed so quickly that it has been the second most popular opera in China.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began, it was suddenly well known in Shanghai in few years. The special period and surroundings of Shanghai city gave Yue Opera the best chance to have its moment besides its improvement. In addition, the psychology of Shanghai residents during the war was another reason.

From Setting Prices to Seizing Rice: Staple Food Supply in Shanghai in 1948

MA Jun

Under the pressure of galloping inflation, National Government carried out the strict policy of setting prices during the period of summer and autumn in 1948. By disrupting the order of supply and marketing of food, this policy aggravated the contradiction among government, food merchants and urban residents, and led to the seizing food unrest in the end. It was worthy of closer look that this incident didn't happen in the famine but in the festival season.

New Arguments on How Emperor Yongzheng Usurping the Throne

JN Heng-yuan

How Emperor Yongzheng usurping the throne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riddles in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It was found out that there were no definite records about designating him to be the successor to the throne in the two pieces of imperial edict left by Emperor Kangxi upon his death, which was written in Manchu characters. It was Emperor Yongzheng that ordered Longkeduo to forge the extant imperial edict.

史林 2004年 第3期 · 总第78期 ·

主管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出版单位：《史林》编辑部(上海市中山西路1610号)

邮政编码：200235

电话：64862266 × 2401

互联网址：www.historyshanghai.com

电子信箱：shilin33@historyshanghai.com

发行范围：国内外发行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单位：上海古籍印刷厂

出版日期：2004年6月20日

刊号：ISSN 1007-1873 CN 31-1105/K

定价：12.00元